

闲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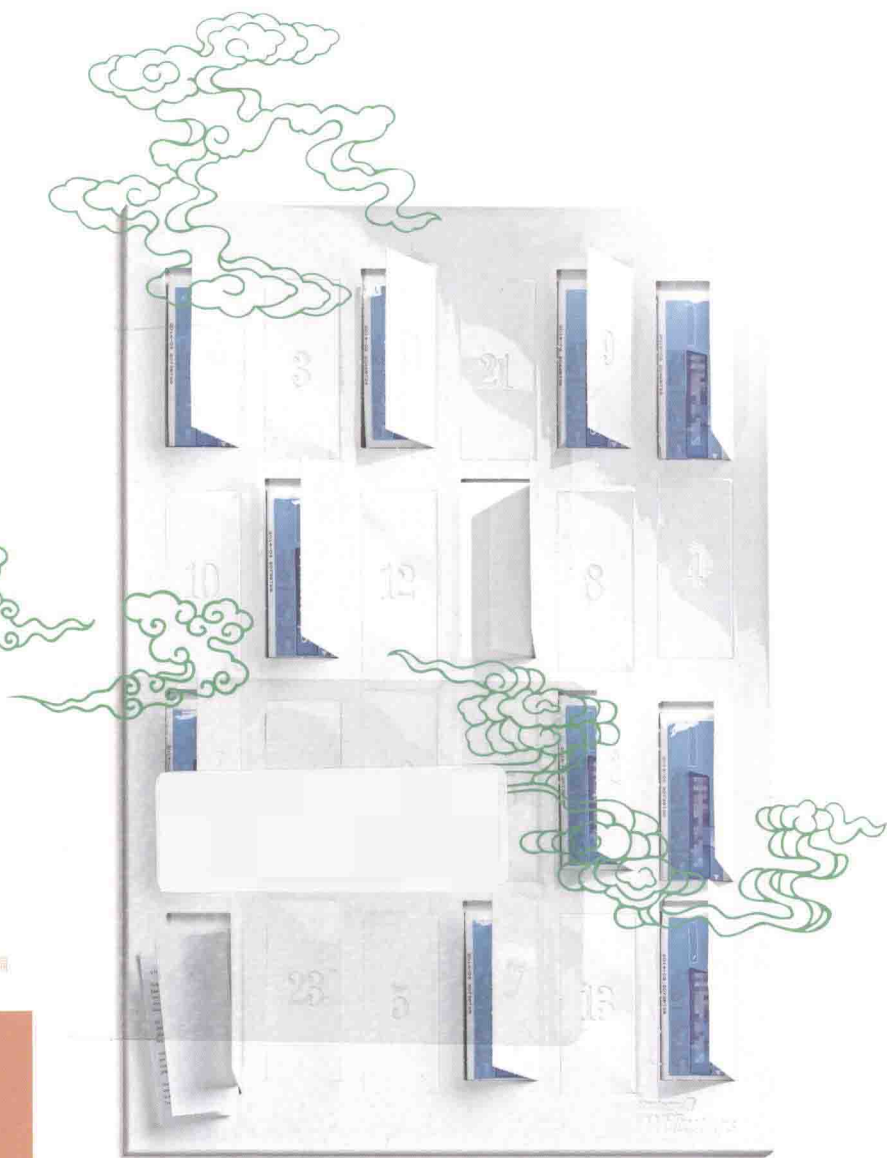
李修文/作品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身份共同体
70后作家大系



山东文艺出版社



写作于我，是避难，是拯救，是我唯一信任的命运。

闲花落

李修文 作品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闲花落

学术策划与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花落 / 李修文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10
(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 / 孟繁华, 张清华主编)
ISBN 978-7-5329-4720-1

I. ①闲…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7818 号

闲花落

李修文 作品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	---------------------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5 插页 / 2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720-1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总序

“70后”的身份之“迷”与文学处境

孟繁华 张清华

当我们决心要把一群“70后”作家装入一个笼子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件难事。因为这些人的创作确乎很难从总体上做出涵盖与评价。除了年龄相近，他们在文学上几乎再没有更多共同之处。

这恐怕与这代人的历史与文化记忆有关。总体上，比较而言，“60后”与“50后”作家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界线或差异，因为他们都有着接近的历史经验与公共记忆。至于“80后”作家，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集体记忆”，他们出生时社会已经开始剧变，走向差异与破碎了。而“70后”这一代，刚好处在历史的夹缝之间——对于历史，他们的印象是若隐若无似是而非；同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急风暴雨式的文学革命与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当他们登上文坛的时候，80年代的文学革命已经落幕了；面对现实，“80后”又横空出世，遭遇网络文学大行其道，没有历史负担的这代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70后”就夹在这两代人之间，他们只能另辟蹊径展现他们的文学才能。因此，这一代的小说可以说一直游移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游移于个体的叙事与公共的记忆之间。

当然，这样的分析或许只是一孔之见。事实上，“70后”作家们用他们的方式仍然创作了许多新鲜而独特的各式小说。当总体性溃败之

后，用“代际”概念来表达创作的差异性也许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但文学批评就是这样，虽然是临时性的概念，但要试图对之进行有效阐释时又不得不用之，而它的通约性也为我们提供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和可能。

或许这样表达不同代际作家的文化记忆或类型是合适的：“50后”、“60后”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共同体”。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大体相似的对于历史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体相似的历史经历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后”是一个以话语方式与关注对象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特殊的情感认同是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70后”如前所述，他们隐约或模糊的历史记忆难以形成明确的历史共同体，同时又不像“80后”那样没有任何历史负担。因此，他们只形成了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并不具有天然性，而是在文学实践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的。“70后”作家曹寇说：“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虽然写作者大多讨厌将自己纳入某个代际或某个类别中去，但‘70后’作为‘60后’和‘80后’之间的那一代亦为客观事实。而且考虑到每代作家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剔除清高和矫情而接受中间代这一说法也未为不可。此外，‘70后’与上下两代人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①更重要的问题是，无论是“50后”、“60后”的“历史共同体”，“70后”的“身份共同体”还是“80后”的“情感共同体”，他们都是“被想象”的共同体。一方面，这一划分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这个合理性并

^①见《曹寇谈70后作家：适逢其时的“中间代”》，《南方都市报》2012年3月30日。

没有被充分证实。王安忆曾经说：“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有人进了天国，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传统，所以，千万不要再说‘读你们的书长大’的话，我们的书并不足以使你们长大，再有二十、三十年过去，回头看，我们和你们其实是一代人。文学的时间和现实的时间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据思想的浓度，思想的浓度也许又根据历史的剧烈程度。总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还要依凭于价值。我们还没有向时间攫取更高的价值来提供你们继承，所以，还是和我们共同努力，共同进步，让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青年能真正读我们的书长大。”^①如果是这样的话，“70后”的身份之“迷”完全是被杜撰出来的，现在的代际划分过二三十年后也将沦为子虚乌有。那时回头看现在，原来是一场毫无意义的白忙活。

然而另一方面，“70后”作家个体的独立或分散状态，也就是今日中国文学状态的缩影和写照。文学革命终结之后，统一的文学方向已不复存在。但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还要特殊一些，这就是他们很难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2009年诺奖获奖者赫塔·米勒说，她的写作是为了“拒绝遗忘”。类似的话还有许多作家说过，但是，这样正确的话对中国“70后”作家来说或许并不适用。普遍的看法也认为，“70后”是一个没有集体记忆的一代，是一个试图反叛但又没有反叛对象的一代。事实的确如此，当这一代人进入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大变动——急风暴雨式的社会与文学变革都已经成为过去。“文革”的终结、启蒙主义年代的终结，使中国社会生活以另一种方式展开，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确立，使每个人都抛却了意义又深陷“关于意义的困惑”之中；同时，自80年代开始的“反叛”又日甚一日地遍及了所有的角落，90年代后，“反叛”的神话在疲惫和焦虑中无处告别，自行落幕。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不论“反叛”的执行人是谁，可以肯

^①王安忆：《在同一时代之中》，见中国作家网，2013年9月24日。

定的是，这一切都与70年代无关或关系不大。这的确是一种宿命。于是，70年代便成了“夹缝”中生长的一代。这种尴尬的代际位置为他们的创作造成了困难，或者说，没有精神与历史依傍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例外。在我们看来，虽然很难对这代作家做出整体性的概括，但他们也确乎没有形成一代人文学的“同质化”倾向。换言之，他们生成了另一种难得的丰富性——他们之间是如此不同，除了一个“身份共同体”以外几乎很难找到他们之间任何两个人的相似性。正是这种不同，使他们在历史缝隙中的突围成为了可能。于是，我们在世纪之交或者新世纪以来，便看到了由魏微、戴来、朱文颖、金仁顺、乔叶、李师江、徐则臣、鲁敏、盛可以、计文君、付秀莹、冯唐、瓦当、路内、曹寇、慕容雪村、梁鸿、李修文、安妮宝贝、哲贵、阿乙、张楚、李浩、石一枫、李云雷、东君、黄咏梅、娜戎、朱山坡……这样一群人构成的“70后”小说家的主力群体。

关于“70后”作家的特征，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三位很早即发表过对话《被遮蔽的“70年代人”》。十几年前他们就发现了这一代人“被遮蔽”的现象，比如他们完全在“商业炒作”的视野之外，还有部分作家所负载的“白领”意识形态对大众的鼓惑诱导等等。但现在看来，之所以会有这些看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50后”这代作家形成的“隐形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压抑和遮蔽。“‘70年代人’中的一些女作家对现代都市中带有病态特征的生活的书写，不能不说具有真实的依托。问题不在于她们写的真实程度如何，而在于她们所持的态度。应该说1998年前后她们的作品是有精神指向的，并不是简单的认同和沉迷，或者说是有某种批判立场的。”这些看法确乎是有远见的，上一代作家在文坛建构起的统治地位和主流形象，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持续压抑和遮蔽了后来者，他们被早已形成的经典化秩序规定了自

己的身份与姿态——“你是一个年轻的、生于70年代的作家，你就是‘新新人类’，否则你就什么都不是。”这一描述道出了“70后”的身份之“迷”和精神的困窘。

但是，许多年过去之后，“70后”仍然以他们的创作实绩，显示了他们令人不可忽略的文学地位。假如要让我们举出例证，那么例证是不胜枚举的。

魏微——她的中、短篇小说，因其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的独特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中国高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魏微取得的成就与她的小说天分有关，更与她艺术的自觉有关——她很少重复自己的写作，对自己艺术的变化总是怀有高远的期待。盛可以，她一出现就显示了不同凡响的语言姿态，她语言的锋芒和奇崛，如列兵临阵刀戈毕现，她的长篇小说如《火宅》、《北妹》、《水乳》以及短篇小说《手术》等，都不是以触目惊心的故事见长，甚至也没有跌宕起伏刻意设置的情节或悬念，可以说，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她锐利如刀削般的语言。在她那里，“怎么写”永远大于“写什么”。李师江，他几乎纠正了现代小说建立的“大叙事”的传统，个人生活、私密生活和文人趣味等被他重新镶嵌于小说之中。李师江似乎也不关心小说的“西化”或“本土化”的问题，但当他信笔由缰挥洒自如的时候，他确实获得了一种自由的快感。于是，他的小说与现代生活和精神处境密切相关，他的小说也是传统的，那里流淌着一种中国式的文人气息。鲁敏，她的小说既写过去也写现在，既有虚构也有写实，关于“东坝”的叙述，已经成为她小说创作的重要部分。这个虚构的所在，在今天已是只能想象而无从经验的了——就像当年的鲁镇、乌镇或其他类似的地方。现代化的进程决绝地剿灭了这些力不从心或没有抵抗能力的脆弱区域，那些渺小而令人心痛的生命。中国的小镇是一个奇异的存在，它在城乡交界处，是城乡的纽带，是过去中国的“市民社会”与乡绅文化存在的特殊空间。在那里，我们总会看到

一些奇异的人物或故事，这些人物或故事是带着与都市和乡村的某些差异来到我们面前的。张楚，他的小说的魅力，就在于难以一眼望穿的模糊。这是一个有巨大野心的小说家，他的作品难以用谱系的方式找到来路，他的小说有诸多元素：深受西方十八九世纪文学、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受到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甚至受到《水浒传》以及其他明清白话小说的影响。经过杂糅吸收和重新铺排，诞生了这个奇异的张楚。看来他是真的理解了小说，他的每篇作品，在生活的层面几乎都无可挑剔，生活的质感、细节和真实性几乎达到了“非虚构”的程度，但是整体来看，其虚构性甚至诗性又都一目了然。在亦真亦幻、真假难辨之间，张楚的小说像幽灵一般在我们眼前飘过。哲贵，这个擅长集中书写富人的存在与精神状况的作家也是一个特例。他所描写的这个阶层在中国是如此特殊——他们是一个“成功者”的阶层，是一个被普通人羡慕乃至仰望的成功人群，但这个人群无所归依、空虚空洞的内心世界，在哲贵的讲述中可谓令人有难以言喻的震惊。东君的小说写的似乎都是与当下没有多大关系的故事，或者说是无关宏旨漫不经心的故事。但是，就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暧昧模糊的故事中，他表达了对世俗世界无边欲望的批判。他的批判不是审判，而是在不急不躁的讲述中，将人物外部面相和内心世界逐一托出，在对比中表达了清浊与善恶。计文君，她的小说仿佛出自深宅大院：它典雅、端庄，举手投足仪态万方。因此她是一位带有中国古典文化气息和气质的作家。另一方面，它诡异、繁复、俏丽，修辞叙事云卷云舒。她的小说有西方20世纪以来小说的诸多技法和元素，但是计文君却又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她是现代的。付秀莹，作为一位后来居上的新秀，起初很长一段时间，她只以孙犁式简约而又清丽的笔触书写她记忆中的乡村，乡村的锦绣年华风花雪月曾让她迷恋不已。近年来，她的创作视野也逐渐转移到了城市，但她仍然写得温婉而跳脱、节制而耐心。娜嘎的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

接续了80年代现代主义的文学传统,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精神馈赠。作为潮流的现代主义虽然已成为了过去,但是,现代主义文学曾经揭示和呈现的关于人的惶惑、迷惘甚至反抗的精神状态和内心要求不仅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比80年代更加普遍和激烈。娜或显然发现或感受到了这一精神现象的存在,因此,以极端化的方式表达这一精神现象,显然是娜或刻意为之的。

.....

就在我们梳理“70后”创作成绩的时候,另外一种批评的声音也如期而至。青年批评家张莉认为“70后”小说家的创作,是“在逃脱处落网”。她认为:“70后作家创作遇到的困境,也是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发展的一个瓶颈:从先锋写作、新历史主义到新写实主义、晚生代/新生代写作,中国文学已经被剥除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思想特质’,它逐渐面临沦为‘自己的园地’的危险。70后作家参与建构了中国当代文学近十年来的创作景观——如果我们了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强调‘祛魅’,即解除文化的神圣感、庄严感,使之世俗化、现实化、个人化,那么70后作家整体创作倾向于日常生活的描摹、人性的美好礼赞以及越来越喜欢讨论个人书写趣味则应该被视作一个文学时代到来的必然结果。”^①这一提醒并非惘然。整体看“70后”作家的创作,历史全面隐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虽然切合了这代人的身份,但也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他们难以与历史建构关系的真实困境。

显然,如果从一般性的常识来看,“70后”作家的多样性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问题就在于他们迄今“经典化”程度的严重不尽如人意。到了应该“挑大梁”的年代,到了应该登堂入室的年纪,到了应该有普

^①张莉:《在逃脱处落网——论70后小说家的写作》,《扬子江评论》2010年1期。

遍代表性的时候，一切却几乎还在镜子里，是一个“愿景”。中国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仍然是“50后”和“60后”的一帮中年作家。究其原因，在我们看来，当然有各种难以言喻的外在因素，但如果从内部讲，恐怕就是因为个人经验书写与共同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接洽问题。在现阶段，否认个人经验或者经验的个人性当然都是幼稚的，但一代作家要想成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记录者，如果不自觉地将个体记忆与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历史氛围与逻辑，与这些东西有内在的呼应与“神合”，恐怕是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的。

或许这与作家的“抱负”有关，也许他们会说，去你们的狗屁“抱负”吧，只不过是一些历史的幻想狂或自大狂的假象，我们就是要写局部、碎片、个人情境。那谁也没办法，但是我们想提及的一点就是，任何人想进入历史都得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如同当代法国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说的，个人记忆是必须要有“社会框架”的，否则就会产生奇怪的失忆症。或许这代人过于无序的经验书写，也是某种社会与历史失忆症的表现吧。

另一方面，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带着西方文学的影响和记忆开始了整体性的“后退”，这个“后退”就是向传统文学和文化寻找资源，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探索是在总体性瓦解之后的探索，因此它有更多的个人性。这也是“70后”作家整体风貌的一部分。“70后”隐约的历史记忆，使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面对个人的心理现实——因为他们无家可归。但是，他们在矛盾、迷蒙和犹疑不决之间，却无意间形成了关于“70后”的文学与心路的轨迹。无论如何，这代作家的成就和问题，都是我们当下中国最典型的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注视这代人文学实践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在关注当下的中国文学。

2014年2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解放	1
弟弟，弟弟	33
苏州	55
麦田里的少校	77
闲花落	115
西门王朝	135
肉乎乎	167
我的江湖	189
夜半枪声	215

解 放

忽闻邻女艳阳歌，南国诗人近若何？

欲寄数行相问讯，落花如雨乱愁多。

——苏曼殊

我既过得了今天，就过得了明天；我既过得了这个月，就过得了下个月。在别人的眼中，尽管我已经是个快要进入风烛残年的老人，但正和天下所有即将进入老年的人一样，我也不肯承认自己的衰老。每天早晨起床之后，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站在屋后的台阶上使劲地撒尿，看看那股浓黄色的水柱到底能够飞出多远。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八年，在这漫长的十五年中，由于没有性生活可过，站在屋后的台阶上撒尿成了检验我是否年轻的唯一办法。我记得，并将永远记得，十五年前的那个冬天的晚上，在从南京到上海的航程中，当我从那艘名叫吉和号的轮渡上腾空而起，最终跳入冰冷的江水之中的时候，脑子里充满的，只是铺天盖地的悲哀，就像那时候我头顶上的夜空，没有一点星光，铺满的，全都是堆积如山的阴云。我又怎么会想到（谁都不会想到），十五年之后，我，诗人朱湘，还会生活在这个自己曾经千百次诅咒过的世界上呢？并且，我还不得不羞愧地承认，生活竟是这样美好。十五年之后，我终于还可以承认，从前，当我还是一个诗人的时候，却更像一个轻佻的寡

妇。这些词——悲哀，忧郁，愁苦——遍布在我的诗歌之中，你说说，这不是轻佻又是什么呢？现在，当我隐居在湖北省荆门市硤石镇上，再翻开自己在一九二七年写下的一首诗时，看见了这样一句话：这样灭亡了也算好呀，省得家人为我把泪流。多么拙劣的句子！读到这里，我的全身都愤怒地颤抖起来，尽管我懂得平和的心态对一个老人的健康是多么重要，但是没办法，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于是，我伸出同样颤抖的右手给了自己一记狠狠的耳光。是的，我在痛悔着我自己的过去。谢天谢地，我终于不再是一个诗人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吗？没有了。

十五年前，当我死亡的消息传遍整个中国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已经获救，而且下决心永远告别诗人生涯，去过另外一种崭新的生活。最初，我被一只小船从水中救起来之后，还没有完全摆脱诗人们固有的表演特征，挣扎着还要再次跳进冰冷的江水之中。但是，挣扎了半天我也没跳下去，还一边挣扎一边回头张望，寄希望于那把我救起来的人伸出手来阻挡。果然，他伸出了他的手，好了好了，必要的过程完成了，我下决心告别人世的愿望已经被人了解无遗，尽管他不是一个诗人，而只是一个渔夫。于是，我放弃了挣扎，换上干净的衣服，陷入了一阵突至的狂喜之中。在随后的半年里，我跟随着这只渔船从长江来到了汉江，又从汉江来到了更多的不知名的河流里，到最后，我终于在湖北荆门永远地居住了下来。原因说来很简单，在此地，那个救了我命的人染上了风寒，拖延了一段时间后竟然不治身亡了。从他死去的那一天开始，直至今日，我渐渐地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在著名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留过学的诗人，而是年复一年地将生命投入到打鱼、补网、上街叫卖这些单纯的劳作中去了。十五年中，每当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都睡不着，我不敢相信——这简单而梦寐以求的生活，终于被我过上了。

一九三四年春天，当我驾乘那只小船抵达荆门市硤石镇的时候，立刻被当地的美丽景色迷住了。当时，我的小船从一片芦苇荡里钻出来，

远远看去，我发现在辽阔的烟波之中，硖石镇的上空被奇怪地笼上了千万道光轮。当即，我就决定在此地定居下来，死后也要长眠在这里。我把船泊在一处码头上，只上了岸，在镇上的茶馆里买了一份报纸，就在这张报纸上，我发现了我的朋友郑振铎的文章，他劈头就写道：闻朱湘投江自杀，为之愕然，不怡者累日！后来，我竟然吃惊地发现，这张报纸整版都在谈论着同一个名字，那就是我——朱湘。在接下来的几篇文章里，我又见到了另外一些熟悉的名字：闻一多，柳无忌，陈翔鹤。闻一多写道：子沅的末路实在太惨，谁知道他若要继续活着不比死去更痛苦呢！柳无忌也说：子沅自杀的消息，如打雷一般，深深地震动了我的心。子沅，是我的名号，现在当我在报纸上看到这在过去时光里曾被朋友们无数次叫起的两个字时，一时竟然不能自制，顿生恍若隔世之感，眼角浮现出了点点泪光。但是朋友们，纵然我并没有死去，你们也不要再指望我回到上海，回到你们的身边去了。从报纸上发表的文字看来，我不无悲哀地发现：到头来，最懂得我的心思的，不是别人，却是闻一多，他曾经是我的朋友，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又互相把对方当作敌人。不过从那天早晨起，我就彻底地原谅了他，在心底把他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两年前的一天，我在集市上卖鱼，回家的时候顺便买了一份报纸，就在这张报纸上，我发现了闻一多被人刺杀后辞世的消息，当即，就如五雷轰顶，我差一点就栽倒在地上。那天晚上，我买了一瓶好酒，带上一些纸钱，把船划进了芦苇荡，在芦苇深处，我点燃了一堆小小的火焰，我知道，在茫茫夜空中，这火焰在照亮我的时候，也一样照亮了闻一多居住的天堂。

现在，已经是一九四八年冬天了，我早就说过，我已经是将老之人，自然也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往事就像一味毒药，过多地沉湎其中只能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加虚弱。因此，相比往事，我更关注自己的生殖器。如果是在从前，每天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尽管有一些困难，但是由于

尿液的帮助，它还会像个慵懒的哨兵一样直起身体站立一会儿；可是现在，虽然尿液仍然像往常一样多得急着从我的身体里挣扎出去，可那个慵懒的哨兵却仍在呼呼大睡，再也听不到起床的号声，我拿它又有什么办法呢？关注它，并不意味着仅仅关注它本身，更是在关注着自己的生命。对我来说，它好像是我的另外一颗心脏，它的跳动和停止都让我感到无与伦比的紧张。有一阵子，我老是怀疑自己再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原因很简单：那股浓黄色的水柱经由它喷薄而出的时候，它竟然没有任何反应，即使是凛冽的寒风也不能让它颤抖一下，就更不用再指望那股水柱能够飞出多远了。在接下去的时间里，绝望纠缠着我，时间好像也停止了，就在屋后的台阶上，我蹲下来掩面痛哭，是的，我舍不得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在别人的眼中，像我这样一个终年累月沉默寡言的老鳏夫，简直没有半点活下去的必要。他们更不能理解，我——一个老渔夫，怎么会养成了读报纸的习惯，每天早晨都会按时到镇上的茶馆里买一份报纸。在他们眼中，我早就该死了。但我不想死，甚至还害怕死，那股早晨的水柱还在冒着热气告诉我：你仍然年轻，还远远没到死的时候。可是近几天来，那股水柱却越来越黄，射程也越来越短，我甚至不敢再面对它，它让我绝望。我知道，在硖石镇，那些与我同龄的人几乎每一个都想死得更早一些——没有粮食，只有战争；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已经化作了战争的炮灰；看不见希望；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深深的担忧和恐惧——这样的日子还过下去干什么呢？可我仍然想过下去，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如果确实要找出理由的话，我想那仍然是出于对从前的那段诗人生涯深深的厌恶，正是这种厌恶，让我在十五年前跳入江水，又让我不远千里来到此地。谁都不会知道，在此地我经常一个人把身体伏低，狂吻着脚下的青草和大地。哦，住在这里，就像住在巨大的喜悦里。打鱼，补网，上街叫卖，这就是一个渔夫兼鳏夫的全部生活。可就是这样的生活，我却过不够，永远都过不够。

如果我可以，我一定会放声歌唱，歌唱我十五年来的每一天。在这些交替出现的白天和黑夜里，尽管我也会像别人一样经常陷入沉思，甚至是愁烦和苦闷，但困扰我的也只是这样一些小问题：打上来的鱼不多，菜里经常没有油，想做件棉袄却买不起棉花，最让我苦闷的，也只是自己打上来的鱼经常被还乡团的人抢走。困扰我的从来都不是这样一些问题：人生的真谛是什么，到底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韵体诗是否比无韵体诗更具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就像昨天晚上，我在大街上边走边看报纸，却不小心撞在了三个来历不明的伤兵身上，他们中的一个当即就恶狠狠地打了我一拳头，正好打在我的鼻子上，霎时间我的脸上就流满了鲜血。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面对这三个伤兵，无论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作为一个渔夫，我都没有还手的力气，甚至连勇气都没有。但是在过去，在遭受到不幸之后，我会将怨气发泄在自己的身体上，把自己当作自己的敌人。在幽暗的书房里，我经常拿脑袋撞墙，甚至用一把小刀割破自己的手指，看着鲜血一滴滴地滴落在书桌上，我也会获得一阵阵潮水般袭来的几乎让我断气的快感。必要的时候，我还会哭泣。而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在，挨了伤兵的拳头之后，我不光没有用小刀割破手指，出乎意料地，甚至还获得了某种快感。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站在大街上问自己。当然答案很快就被我找到了：因为对生活和时代的爱，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既与世无争又心平气和的人。对这个发现我感到欣喜若狂，我离开大街来到芦苇荡中，坐在芦苇中，我想起了一句诗，那是我年轻时在芝加哥写下的，献给了一个身材饱满的美国少女。可现在这首诗却好像自己从大地和烟云深处走了出来，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涌到了我的嘴唇边，迫使我把它念出来。我只好听命于它，念出来，用它赞美自己，就像赞美身材饱满的美国少女。轻微的风在我耳边回荡，我的眼睛中涌出了泪水，我竟然伸出双手去抚摸自己的全身，一边抚摸一边对自己说：哦，我爱自己。